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5.05.008

# 美国女传教士与福建近代公共空间的文化传播

## ——以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为个案

陈忠辉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近代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促进了当时在华传教士教师的专业化进程。到海外传教成为美国知识女性突破国内性别壁垒的职业选择,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在这一浪潮里先后入闽从事教育与慈善等公共事业。以三个地方性个案为例,解读女性志愿者在国家力量与专业知识支持下促使福建社会公共空间向当地女性开放的进程。

**关键词:** 女传教士; 公共空间; 女子教育; 社会慈善; 福建教会

**中图分类号:** I03:G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5)05-0442-04

##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ies and the cultural expansion of modern public space in Fujian

Chen Zhonghui

(Humanities Department,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Student Volunteer Overseas Missionary Movement in America propelled the professional progress of missionary teachers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be a missionary overseas was an educated woman's career choice to break through the gender barriers in America. Female missionaries – Miss Emily Susan Hartwell, Mrs. Elizabeth Fisher Brewster and Miss Bertha Harding Allen, came to Fujia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starting from 1880's) to engage in public course such as education and charity. The three cases are examined to explore how the women missionaries promoted Fujian social public space to open to local Chinese wome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ir national power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Keywords:** female missionary; public space; women's education; social charity; church in Fujian

福建的福州与厦门在1842年被迫开放通商,成为近代史上中外文化碰撞与交融的重要坐标。近代来华传教士做为西方文化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福建社会开化与现代化进程。女性传教士入闽不仅打破了福建近代社会性别隔离的传统,同时带动当地妇女进入社会公共空间。

美国女性传教士的大量入华与其国内妇女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开始打破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性别壁垒,走出家门参与禁酒、慈善、教育及宗教等活动。但社会依然要

求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不能挑战既有的性别结构与社会分工。传教领域是美国女性在国家生活中能够多少可以获得与男性平等地位的第一个专业领域。<sup>[1]181</sup>当时美国社会所推崇的“纯正女性风范”强调虔诚、贞洁、温顺和齐家,这些品质从抚育基督教家庭扩展到教化海外异教徒。走出国门的女性在美国对外扩张进程中被视为国家道德的楷模。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兴起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志愿者被派往中国,这一举措促进了教

收稿日期: 2015-06-27

基金项目: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12421S)

作者简介: 陈忠辉(1968-),男,福建福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 教育史及教师教育。

会学校教师的专业化进程。志愿者成员中女大学生占多数,1890年女性已占美国在华传教士的60%。<sup>[2]</sup>到1911年,在华美国传教士有半数不再传教,其中大多数投身教育领域。在美国海外志愿服务成了女性突破国内性别歧视的职业选择。她们可以进入男性禁区的“东方闺房”,通过慈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事业影响妇女与儿童,以达成更富成效的宗教传播与文化扩张。她们在海外避开了与男性的直接竞争,顺理成章地以“自我牺牲”和“以身奉主”的宗教话语获得了权力和自我实现,成为“纯正女性风范”的典型。在“妇女工作为妇女”的口号下不动声色地进入了东方男性把持的传统公共空间,凭借殖民国家的力量和男女平等的西方话语体系,以其专业知识成为充满权威力量令人不敢冒犯的“母老虎”,将西方已经觉醒的性别意识及妇女性别空间的概念,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她们在华的各种活动,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冲击力量。

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是在世纪之交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先后来闽的女性教师志愿者,她们以知识精英的身份长期从事教育与慈善等社会公共事业。本文试以三人为个案探讨女性传教士对当地妇女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影响。

## 一、夏咏美：单身女传教士的样本

夏咏美(Emily Susan Hartwell, 1859 - 1951), 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其父夏察理(Charles Hartwell)是公理会在福州传教的开拓者之一。<sup>[3]</sup>1883年夏咏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惠顿学院毕业,因母亲在福州去世,奔丧后长留中国与父亲一起工作。她成为海外传教士完全是受牧师家庭的影响,她以单身职业女性的身份一生致力于改善福州妇女儿童生活地位的教育与慈善事业,在华服务达54年之久,直至1937年返美。<sup>[4]</sup>

作为在福州出生的第二代传教士,夏咏美能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拥有很好的人脉资源与很强的活动能力,成为深深植根于福建当地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活动家。1919年福建省政府授其勋章以示嘉奖,1935年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主席林森接见了这位为慈善事业奉献一生的古稀老人。考察其在福州半个世纪的教育经历,夏咏美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推动教会女学从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

夏咏美最初跟随父亲在格致书院任教,她在这所福建最早的现代男子中学任教长达20年。作为知识女性,她对中国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歧视不以为然,同情中国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积极参与筹建女子中学。1894年在保福山女学堂增设女书院(女子中学)并负责管理,向女生宣传国民意识。为了培养有一技之长的女国民,夏咏美也介入女子职业教育,1911年她领导一个9人委员会开始筹划在福州发展幼稚师范以培养女性师资的计划,促成三家教会共同筹办“福州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她积极在美国筹措项目资金,历经4年,学校终于在1915年开始招生。夏咏美领导董事会确定了聘用专业化师资的原则,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解决了专业师资的来源问题。她从加州筹款而建成的幼师教学楼于1923年竣工。<sup>[5]</sup>协和幼师向福州社会展示了典型的欧美学校董事会的运行模式。

2. 关注孤儿与弱势群体,兴办慈善事业

1908年,夏咏美争取到美国《基督教报》的资助,在福州仓前山创办了孤儿院,收养的孤儿从100余名逐渐发展到500多名并常年维持,这对改变当地时有发生溺杀女婴的陋习有着积极影响。她还在鼓楼河西街设“工艺传习所”,在闽江口外川石岛设“工读学校”,在马江对岸白牙潭办“妇女工艺传习所”。她大量招收青年女性习得藤竹器具、脱胎漆器、刺绣等一技之长,开办木工工场、印刷工场等实业为当地女性提供就业机会。<sup>[6]</sup><sup>842</sup>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福州旗人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她又筹款救助满族难民。

3. 展示西方单身职业女性的积极形象和性别意识

当时单身女传教士给中国人的印象多是刻板而缺乏女性气质的老处女。女性传教士在社交上处于隔绝状态而导致欠缺女性特质,被视为“男性化的女人”<sup>[2]</sup><sup>66</sup>。但夏咏美展示了优雅的女性形象,性喜社交,爱好摄影,她的相册保存了她在福州各地游历见闻,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传教活动。照片里的她打扮得体,光采照人。格致书院的学生回忆起她当年教授英美诗歌,平时爱好文学,常有诗作,与同事、学生、女信徒都有着亲密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夏咏美向当地民众展

示了西方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可、展现自我的愿望和广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 二、蒲星氏：传教士妻子的事业突破

蒲星氏 (Elizabeth Fisher Brewster, 1862—1955) 是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 1883 年来华, 1889 年在福州嫁给牧师蒲鲁士 (William Nesbitt Brewster, 1864—1918)。在华活动长达 65 年, 其中在兴化 (今福建莆田) 56 年。她突破了教会传教士妻子固守“纯正女性风范”的传统期待, 一改以齐家为重, 以丈夫为中心, 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妇女形象, 积极投身到教育与慈善等公共空间。夫妻俩携手合作成就梦想。

1890 年, 蒲星氏夫妻被调往闽中兴化府传教, 传教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和偏远海岛的渔民。他们从相对繁华的通商口岸到更为艰苦的县城兴办公益场所促进传教, 包括兴建福音书院、西学斋、兴仁医院、孤儿院、戒烟社等, 还兴办实业, 组建东南亚垦殖农场, 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当地社会风气。在一个男尊女卑意识更加深厚的封闭乡村, 女性传教士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蒲星氏主要着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办慈善机构

1894 年, 蒲星氏在涵江铺尾收容女麻风病人, 为其提供有体面的生活。莆田善育院是美以美会在福建经营最久的一所慈幼机构, 收容当地孤儿和残疾儿童, 蒲星氏从 1902 年开始担任善育院院长达 22 年之久。1926 年又在黄石、涵江、塘头设立 3 处盲童学校, 招收盲童实施教育。这些善举在当地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 2. 办基础教育

蒲星氏在莆仙一带兴办了多所学校, 特别是在当地开创了女子学校与学前教育。1892 年创办的咸益内女学是当地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 后发展成咸益女中与铸益小学。1893 年在女学增设幼稚园, 这是学前教育在闽中地区的开始。她还办过短期的简易师范班, 1898 年出任西学堂的监督 (即校长), 将其发展成含高中 (上学)、中学、小学 3 部的培元学堂。这些学校为当地培养了人才, 特别是让女子开始有机会接受学校正规教育。

### 3. 开展妇女工作

蒲星氏和其他女传教士并不满足于学校工作, 她们通过召集妇女开会与识字、训练熟读圣经

的妇女和直接的乡村布道等活动展现其女性魅力, 并与当地妇女建立了友谊。她们的价值观念、性别认识对当地妇女产生极大的影响。蒲星氏还组织当地妇女参加公益社, 上街宣传劝戒鸦片; 教导妇女认识以罗马文记录的兴化语以期能识字看报; 向当地妇女大力倡导新法接生、住院护理等公立医院模式, 使得医院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公共生活区域。1947 年, 涵江修建“蒲星氏产科院”, 施行新法接生, 以院名纪念其造福当地妇女之功德。<sup>[8]65</sup>

### 4. 办报宣传

办报是教会扩大在华文化影响的新形式。1898 年, 兴化音罗马字的《奋兴报》创刊, 蒲鲁士为发行人并担任主编 10 年, 这是莆田县、仙游县有报纸之始。<sup>[7]12</sup> 该报涉及地方新闻、教会新闻、中外时事、经济生活、民俗民情、奇闻异事等内容, 扩大了公众的信息量。报纸选择用罗马文, 意在降低阅读门槛, 让受过粗浅训练的底层群众与妇女都可以成为受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开化。《奋兴报》后改为罗文、中文、英文三种版本, 直到 1949 年 8 月终刊, 它也是福建省解放前所办时间最长的报纸。

做为传教士的妻子, 蒲星氏没有退缩在丈夫的身后, 而是活跃在社会公共空间, 以自身的行动向中国民众展示西方女性的能力与博爱情怀。她对女性麻风病人、弃婴、盲童等被社会遗弃人群的关爱, 对当地基础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推进, 对莆仙乡村社会影响是震撼性的, 许多孤苦无依又目不识丁的妇女及其家庭接受这种域外宗教, 凭借的不是对教义的理解而是对美好生活或者说是现代化的期待。

## 三、安毓明：专业教师的新形象

福建的学前教育在清末民初走在全国前列, 这与女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1917 年《中国宗教年鉴》记载福建教会所办幼稚园共有幼儿 833 人, 学生人数居全国首位。<sup>[8]88</sup> 为了解决专业师资短缺的问题, 英国长老会于 1912 年在厦门创办怀德幼稚师范学校, 这是全国第一家独立设置的幼稚师范。1915 年夏咏美筹办多年的协和幼稚师范学校在福州建成, 安毓明就是她根据师资专业化的原则聘请的第一任校长。

安毓明 (Bertha Harding Allen, 1889—1947),

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帕萨迪娜,其父母都是公理会在南加州的骨干,自小按照“坚定的新一代”的目标加以培养。安毓明在波莫纳学院毕业后又进入洛杉矶州立师范大学深造,后来成为南加州公理会派到国外工作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志愿者,<sup>[9]</sup><sup>330</sup>其在华时间约在1915~1939年之间。

与夏咏美和蒲星氏相比,民国初期来华的安毓明则是另一种类型,其教师身份认同远远超出传教士角色。她在大学毕业后又接受过师范教育,而且是当时少有的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华期间,她引进了西方学前教育教师培养的教学方法和办学经验,奠定了幼稚师范与幼稚园的办学模式。她首先规范了幼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开设了圣经阅读、旧约人物、约翰福音、主日学入门等宗教课程;儿童研究、游戏理论、幼儿故事、福禄培尔生平等理论课程;乐理、钢琴弹唱、唱歌、绘画、手工等技能课程;自然、体育、国文、历史、英文等文化素养课程。其次,确定了教学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职业教育理念。协和幼师从一开设就同时附设幼儿园,这是学习了欧美幼师学校的做法,类似于学徒式培养,教学实践的比重占总课程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她重视幼儿的行为规范、游戏与户外活动,亲自教导实习生观察与了解幼儿。再次,努力以浓郁的宗教气氛培养信徒。在学生中组织女青年会的活动,努力吸引中国家庭成为基督徒。她也带来了现代公民意识,鼓励学生做有一技之长的健康国民。<sup>[10]</sup><sup>83</sup>

教会女校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所创办的福建两所幼师使得当时女性接受学校教育和职业训练成为可能。这两所幼师通过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成长为知识女性从而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增强女性自立自强的经济基础。学校宣传了平等、独立、自由的女性风范,甚至从新式校服等细处引导新的社会时尚,推动审美情趣更新。诚如女传教士程吕底亚在担任华南女子学院校长时所说:“中国妇女完全有受教育的能力和权利,我就觉得只要有人关心中国的女孩和女青年,没有什么不是她们办不到的。我很愿意告诉她们五个字:‘我能且我会’(I can, and I will.)。”<sup>[11]</sup><sup>70</sup>

#### 四、女传教士对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影响

到1919年,女性传教士已占到了美国在华传

教士的三分之二。<sup>[12]</sup><sup>22</sup>虽然她们在当地民间记忆中往往被称为“师姑”而没有留下明确的姓名,但她们在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努力得到当地民众的承认和尊重,其贡献不应被埋没。按美国学者Charlotte Beahan的说法,女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启蒙,其关键更在于个人生活中所传达出的世俗意义而非宗教同化的功绩。<sup>[12]</sup><sup>48</sup>

前述三份地方性个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影响下女志愿者在华的宣教与社会服务。作为来自西方传教团体中的女性工作者,她们通过在华参与公共空间事务体现自身争取女性解放与肯定自我价值的决心,展示独立、自信、韧性甚至权威的新女性形象,将美国的妇女性别意识带入中国,也促成教育与慈善等公共事务向当地女性开放。在教会女学的带动下,1907年福州出现了官办的女子师范传习所,为官办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培养合格师资。<sup>[8]</sup><sup>489</sup>

女性传教士借助殖民者的特权地位和专业知识的力量,以其女性特质柔化了男性传教士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福建公共生活的传统,西式学校、西式医院、孤儿院、育婴堂、幼稚园、妇女工艺传习所、女青年会等新鲜事物渐次出现,客观上促进了现代社会新式公共空间的产生。经由女传教士的努力,妇女作用在上述公共空间得以展现和发挥,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动摇中国传统的性别伦理。福建民间社会出现了妇女宣传劝戒鸦片、接受西医与接生新法、社会化学前教育机构与女子公共教育等新风尚,突破了“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定位,催生了最初的女权意识。夏咏美组织的妇女工艺传习所等推动了女性开始争取自谋生计,蒲星氏在兴化为女麻风病人、孤儿和盲童等提供的慈善服务给弱势群体争取体面生活的希冀。安毓明的幼师教育不仅提供女性职业教育,同时也促进了学前教育在中国的公共化和学制化。

总而言之,女传教士们在福建的传教及其在福建兴办的教育与慈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福建社会的性别屏障,扩大了福建女性的社会活动公共空间,使福建的女性拥有了性别自视的机会,为近代福建妇女的觉醒与解放播下了启蒙的种子。

(下转第499页)

该发挥班导师在专业上的优势和人格魅力,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基于因材施教原则,探索适合学生成长、成才的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和形式。如对大学生职业规划、创新创业、学科竞赛、学风提升等进行立项,在学期末提交成果进行考核,从而既保证班导师做好育人工作,又创新工作方式,使工作成效在多渠道方式下得到加强。

4. 加强观念引导,增强师生对班导师工作的信任与支持

高校推行班导师工作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后效性和长效性角度来看还需要在前期努力摸索,全力推动。其中,在全校教职工范围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学校和各学院也须加大对班导师工作的宣传力度,把该项工作列入党政工作重点,并指定专人进行管理。同时,学校和各学院也可采取多种形式对班

导师工作进行专栏报导,每个学期定期进行班导师工作展示,让师生了解班导师工作的具体情况,展示班导师工作风采。在工作过程中,积极挖掘、塑造先进典型,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推广,从而使班导师工作深入全校师生内心,在师生中获得更加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综上所述,专业教师担任低年级本科生班导师,可进一步发挥专业教师优势,促进专业教师更好地融入学生中去,为教师工作时空与学生学习时空相融合提供有效保障,有效解决专职思政干部专业短板与学生专业发展相脱节的问题,让专业教师自然融入“大思政”视野中,从而在高校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上开创更加良好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王蔚岚. 教学型大学中班导师的作用初探[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26(9):107-108.  
[2] 唐勇军,郭钟宁. 高校工科类大一新生班导师工作探讨[J].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S0):274-275.  
[3] 林鹏. 高校本科生导师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要求[J]. 集美大学学报,2008,9(2). 14-16.  
[4] 宇振盛,于金红. 做好“90后”大学生班导师工作的实践与探讨[J]. 师德师风,2009(12):9-10.

(责任编辑:许秀清)

(上接第 445 页)

参考文献：

[1] Smith P. Daughters of the Promised Land[M]. Boston: Little Brown,1970:181.  
[2] 简·亨特. 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女传教士[M]. 北京:三联书店,2014.  
[3] Crouch R A.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M E Sharpe,1989:171.  
[4] Hartwell E. 92, Long a Missionary[N]. New York Times,1951-10-05(24).  
[5] Woman’s Board of Missions. Life and Light for Woman[M]. Boston: Nabu Press,1912:264.  
[6]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州市志:第 6 册[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7]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 新闻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8]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 教育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9]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The Missionary Herald at Home and Abroad (Vol 134)[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8.  
[10] Woman’s Board of Missions. Life and Light for Woman (Vol 149)[M]. Boston:Nabu Press,1919.  
[11] 朱峰.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2] Beahan C.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Ch’ing[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1976.

(责任编辑:许秀清)